



# 巴中 我永远怀念的母校

## 北京 50年届 梁英明 10

上接印尼新报329期

### 巴中新校舍

巴城中学是二战后才创立的一所新学校。建校初期，巴中连校舍都没有建成，只能借用广仁学校和华侨公学的教室上课。比起二战前创立的八华中学和中华中学等老华校，巴中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只有依靠全体董事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以及华社各界热心人士的积极支持和赞助，巴中才有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成为雅加达乃至印度尼西亚的一所著名华校。

1947年，我就是巴中借用的宛朗岸（Blandongan）旧校舍开始上第一课的。后来，巴中在芒加勿刹（Mangga Besar）街开始修建新的校舍。我升入高三时才转到新校舍上课。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巴中每年只能修建一部分教室。初中部仍留在宛朗岸。

1950年我开始在巴中任教时，还是要回到宛朗岸旧校舍上课。后来，巴中招收的新生人数急剧增加，教室不足的矛盾就愈发突出。为了满足上课的需要，学校不得不在篮球场旁边搭建了一排简陋的教室。这些教室不仅面积狭小，而且只有靠外侧修建了砖墙，靠



椰城华侨庆祝第三届国庆 一九五二年

### 林兆南总领事出席雅加达华侨庆祝中国国庆运动会

里面的一侧却没有任何墙体，以致在下大雨的时候，雨点就会洒到坐在靠边座位的同学身上。

为了筹集建校资金，1952年在各班学生中开展了一场“献砖运动”，即发动同学家长捐助建校经费。捐款金额以砖为单位，因此称为“献砖运动”。周末的最后一堂课，各班在班主任主持下由学生分别自报家长献砖的数量，并开展竞赛。一开始，学生往往少报献砖数，然后相互挑战，不断增加献砖数量，直到全班在欢呼声中胜利结束。我认为，当年的“献砖运动”一方面体现了华侨社会热心支持教育事业的传统精神，但在另一方面，捐献本应该以自愿为原则，而且必须量力而行，不应勉强。为鼓励家长捐献而在学生间采取竞赛的方式，无疑给一些家境困难的同学增加压力，这一做

法是不可取的。

我和黄天美毕业任教时，都在校外租房居住。我们每日除上课外，还要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住地离学校比较远，工作自然受到影响。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工委李梅老师的家在巴中附近，她了解我们的困难，慨然让我和黄天美在她家暂住。这对巴中和我们来说，无疑是十分及时的帮助，我至今铭感在心。在毕业留校任教的青年教师中，来自雅加达以外地区的越来越多，在雅加达又没有住家。于是，巴中在新校舍内修建了四个房间的教师宿舍，我们八位青年教师便得以集中住在校内，直到1955年我和黄天美、潘志强同船回国，才告别了这个值得怀念的教师宿舍。

### 《中学生月刊》

1946年初，雅加达巴城中学、中华中学和八华中学联合成

立中学生联合会，并在中华中学张国基老师的倡导和支持下出版《学联会月刊》。由于刊物内容过于激进，在学联会理事中引起争议，月刊只出版两期即宣告停刊。1947年初，一部分同学又成立一个新的团体，称为中学生社，并出版《中学生月刊》，由杨维灿任社长，李尊贤任编辑，陈长淦任财政兼发行工作。聘请华中张国基老师和新华中学校长杨新容老师及《新报》记者温德玄（慕由）先生为顾问，并请张国基老师题写刊名。

不久，杨维灿等主要创办人相继去香港达德学院学习，游禄中（胡月）继任总编辑。后来，任觉（华中同学）和我加入编辑部。《中学生月刊》创办初期，人员很少，经费困难，编辑部约稿、写稿、改稿和排版工作，都没有任何报酬或稿费。幸亏得到一些爱国华侨和《新报》的帮助，才得以按期出版。尽管如此，游禄中先生有时还需垫付一些费用，以解燃眉之急。《中学生月刊》设有笔谈、印尼史话、自然科学、青年习作以及木刻漫画等多个栏目，它虽以华校中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但同时也

受到许多爱国华侨青年职工的欢迎。作者队伍也逐渐扩大，如巴中教师李伟康（阿五）先生、《新报》的温德玄（慕由）先生和《生活报》的杨化先生，都是《中学生月刊》的热心作者。1950年后，刊物销量迅速扩大，读者遍及印度尼西亚各大城市，各地均有代理处。

《中学生月刊》的工作都是义务的，编辑部成员也常有增减。巴中教师曹辉贤（李宿）、林家骏和华中教师蔡仁龙等均曾担任编辑工作。1952年，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局的变化，游禄中先生举家归国，由我接任总编辑工作。1955年我回国升学后，《中学生月刊》由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文教部接办，新华学校甘甲松老师任总编辑，邹访今先生等任编辑。1958年停刊。

### 《生活报》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雅加达早已有两家著名的华文日报，就是《新报》和《天声日报》。它们在日本占领时期都被当局取缔，直到战后才得以复刊。《新报》一贯秉持民族主义立场，同情和支持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最受华侨读者欢迎，也得到印度尼西亚各界人士的尊重。《天声日报》则是中国国民党人创办的报纸。我在